新疆汉语方言中的语气词“萨”

彭 嫵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根据新疆汉语方言和青海汉语方言在语气词“萨”字使用上的方言和区域特征, 认为“萨”字是阿尔泰语言成分随迁徙的人群扩散到其他区域, 再与不同的语言接触后产生的语言成分的新发展。

关键词: 语气词“萨” 新疆汉语方言 青海汉语方言 条件式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新疆境内的汉语方言分为中原官话南疆片、兰银官话北疆片和北京官话片^[1]。在新疆汉语方言中, 有许多句尾加语气词“萨”的句子, 它们表示如下意义:

- (1) 表示条件或假定意义。如:
 - a. 都买上萨, 没有那么多钱。
 - b. 你不去萨, 他也不去。
- (2) 表示请求、愿望、祈求等祈使意义。如
 - c. 别喊萨, 人家睡觉的呢。
 - d. 去萨, 你不去就没有意思了。
 - e. 把他也叫上萨, 我们是一块儿的嘛!
- (3) 表示疑问语气。如:
 - f. 哎, 最近身体好的呢萨? (哎, 最近身体好吗?)
 - g. 我们去不去萨? (我们去还是不去? /我们去不去呀?)
- (4) 表示停顿语气。
 - h. 这个人萨, 不好说。
 - i. 我说你萨, 别说了好不好。

在普通话中, 表示祈使意义的语气词有“吧、嘛”等, 表示疑问语气的有语气词“吗、呢”等, 表示条件意义的语气词有“的话, 吧”等, 表示停顿语气的有“呀、嘛”等。

实际上, 在汉语的许多方言中, 用“或 sa/se”(如四川话用“噻”、湖北话用“啷”、南京话用“嘎”……) 语气词的不同变体表示各种语气。但笔者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报告和自己的思考, 认为新疆汉语方言、甘青地区汉语方言在语气词“萨”字的使用上具有区域上的一致性而不同于上述汉语方言。例如在《西宁话方言词典》中:

“[煞]·sa 语气词, 表示催出、请求、命令的意思, 大致相当于北京话的‘嘛、吧、吗、呢’: 快吃~! \早你快些~! \给我看给个~! \你去喊给个~! \迟下了, 快去~! \来了哇, 那你做下~! \报纸还没来~? \你们啥时候回来哩~? \致个丫头是家的妹子~? \你实话带到了~? \那你最近稳当者~? \”^[2]。

李克郁论述青海汉语中“萨”及其语义, 如: 天上萨掉下来了一件宝物\去年萨开始我身体好多了\西宁萨到毛泊胜有四十里等。其中“萨”字依次表示行为动作的起因、起始时间和动作行为的起落点。他认为是受蒙古语从格形式的影响^[3]。余志鸿对蒙语中表假定意义的结尾助词-(B)A U 译音的研究表明, -(B)A U (如果在元音后便出现 B, 在辅音后面 B 不出现, A 和 U 表示按元音和谐律变化的音位变体, 出现在同非将来时有关的副词中, 并且往往带假定意义^[2], 直译汉字为“呵”, 在对译文中也可意译为“时”, “呵”后被“时”字挤压, 到明初便替代“呵”而流行起来, 只残留在部分方言中, 如汉语西北方言——青海话

通常便是用后置词“呵”来表示假设。他认为这种结果是两种结构不同的语言（汉语和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笔者注）长期接触产生的“借用”效应^[4]。

在现代突厥语族诸语言中，由古代突厥语-sar/-sɛr 演变而来的条件式词尾，有维吾尔语的sa/-ɛ，塔塔尔语的-a -sæ，哈萨克、西部裕固语、撒拉语的-a -e，乌孜别克语的-æ，柯尔克孜语的-a -e，-so -∅以及图瓦语的-a -e，-a -e。除了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条件式词尾后不缀接人称——数词尾，新疆的突厥语族诸语言假定式词尾后均缀接人称——数词尾^[5]。许伊娜根据突厥语共有形式-a/-ɛ在维语中的语义和结构分析，认为现代维吾尔语的条件形式是多功能的，除了表达各种条件性语义外，还表达时间、情态语义等^[6]。杨新亭也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维吾尔语动词条件式不表示条件意义的用法^[7]。王远新教授不仅分析和总结了现代哈萨克语动词条件式-a -所表达的让步、假设和条件意义以及时间、情态意义，而且研究突厥语条件式的发展过程后认为：突厥语条件式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原始时期，即古代突厥碑铭文献时期，突厥语共有条件式形式-a /-ɛ 时期；分化时期，回鹘文献时期的句法手段和词法手段并存，即-a /-ɛ 后缀接人称词尾的句法手段形式和 -a /-ɛ

和其他词组合的词法手段形式并存；完整定型时期，黑汗时期句法手段占绝对优势时期，即-sa r /-sɛ 后缀接人称词尾的句法手段形式战胜并取代词法手段形式，并且比较固定^[8]。参照上述例句，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新疆汉语方言中的语气词“萨”很可能是在突厥语的影响下，主要借用维语的语音形式产生的。因为从汉语的其他方言（除河州话）的角度难以说明，而且“萨”的语义，无论维语-a -sɛ还是哈语-a -e的音译都与新疆汉语方言中的语气词“萨”的音义很有相似之处。

考察现代维语动词条件式的使用情况，我们可知道，维语复句中的动词条件式一般都表示条件意义（但也有几种情况不表示条件意义），汉语译为“若、如果，……的话”。但是，虽然有的动词也用了条件式的形式，尤其是单句中的动词条件式，即句中只有一个动词，或虽有两个动词，表示的却不是条件意义，有可能表示请求、恳求、疑问、停顿语气。

“萨”字不仅在新疆汉语方言，而且在青海口语也大量使用的事实，换句话说，在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语言区域内广泛使用的区域特征（当然“萨”字在各方言中的用法还有地域上的差异），说明“萨”字的使用确与汉语和阿尔泰语的相互影响有关。如果是偶然的巧合，就不会出现如此一致的现象。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撰文论证甘青地区的区域语言特征。这种鲜明的语言区域特征和语言结构类型上的联系，桥本万太郎先生称之为“汉语的阿尔泰化”^[9]。罗杰瑞先生认为，“很可能，阿尔泰语在汉语的语法里比在汉语的词汇留下了更多的印记。……还有，北方汉语中SOV句型的发展，也可能受只有这种词序的阿尔泰语的影响所致。”^[10]徐通锵教授也同意汉语受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10]。梅祖麟先生则认为“某种结构的功能可以用来解释某种结构的流行，但不可以用来解释它的产生。”^[12]固然语言演变的原因要先从其内部因素探索来寻找，若内部的演变规律不能解释，须寻求外来的影响。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证明，语言影响是无界的，语言接触的深层影响会使语言结构发生变化，如在青海，分析型的汉语变成了黏着型的河州话^[13]。正如布龙菲尔德所说：“有许多言语形式，并不是同一语言结构的较早阶段就已经存在的形式的继续。这在借用的事例上是显而易见的”^[14]。霍凯特也说：“在有的地区，没有亲属关系或亲属关系疏远的语言似乎共同具有一些重要的语法特征，这些特征不大可能是每种语言完全独立发展出来的”^[15]。笔者赞同王士元先生“我们今天的各种方言，最初都是以中原地区扩散开来的汉语为表层，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为底层语言，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16]这一说法。北方阿尔泰民族的力量过去曾经比今天强大得多，在过去的历史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里，北部中国是在阿尔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王朝的控制之下，离我们最近的是元朝和清朝两个阿尔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而在此之前有所谓“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孟达来博士认为“其（匈奴）语言可能对其他民族或部族（如北边的丁零和东边的东胡等）的语言产生

过相当深刻的影响”^[17]。最为主要的是这个第一个见于史籍的蒙古高原上的民族共同体，在公元三世纪末，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国家。匈奴国家崩溃后，一部分（“十余万落”）融于鲜卑、一部分（有人认为“至少有二十万人左右”^[18]）融于丁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融于中原汉族。匈奴人的流向，意味着其语言的流向。匈奴语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仅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如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的发展演化以及共同要素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国的汉族形成于汉朝。汉朝初期，陕西省的西部和甘肃、新疆都是氏、羌、乌孙及西域各地土著民族的居留地。元狩二年（前 121 年），霍去病大败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率众降汉，河西地区归汉所有，汉朝始设武威郡和酒泉郡；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朝又分武威郡之地置张掖郡，分酒泉之地置敦煌郡，移民实边，大批“山东平民，即今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的百姓进入河西四郡。公元前 60 年，汉朝在西域设都护府，屯垦戍守，其将士大多来自河西走廊和黄河流域中下游。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大乱，无数难民涌入河西走廊，其中又有不少转徙西域，天山南北多有汉族，吐鲁番盆地还建立了以汉族居民为主的麴氏高昌汉族政权，统治达 140 年之久。后唐朝统一西域，设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驻守和屯田的将士也大多来自黄河流域；清朝和民国时期，乾隆移民屯田，河西走廊和黄河流域的汉族移民纷纷西徙新疆。因此，新疆、甘肃和陕西的异常血红蛋白基因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 Hb Taipei 异常血红蛋白^[19]为数量最多……，而以发源于我国东北的 Hb Coshatta 异常血红蛋白占第二位^[19]。

从体质人类学的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在东北和北方草原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不同体质类型的族群。到了晚期，这些不同的体质类型之间出现混合的现象，北方和东北地区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之间曾经发生过相当程度的混合与融合^[20]。与人种体质特征的混合与融合相并行，其语言的混合与融合也不可避免。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一个群体更可能和邻近的群体在语言上和生物学上相互影响。“事实上，产生具有相同基因这种更为亲近的关系，常常是以一种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前提”^[21]。笔者认为，新疆和青海地区汉语方言的诸多区域语言特征，毋宁说是阿尔泰语言及汉藏语言特征在地域上的扩散。

参考文献:

- [1] [芬兰]G·J 兰司铁著，陈伟、沈陈明译.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2]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 霍凯特. 语言论(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4] 王士元. 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5] 陈保亚. 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Sa(萨) i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PENGYAN

Xinjiang Univ.of the Humanities.,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sa(萨)'s similar dialectal character and area character between Xinjiang and Qinghai Chinese Dialect, the paper holds that is the result of diffusion of sa, which showed the subjunctive mood in Altaic language,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it contact with different language.

Keywords: sa(萨, an auxiliary word that indicates mood);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收稿日期: 2005-07-14

基金项目: 新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彭熾 (1967—), 女 (汉族), 湖南衡阳人,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 [1] 刘俐李. 新疆汉语方言语音特点的扩散[J]. 新疆大学学报. 1995, (1 期): 80-81.
- [2] 李荣主编, 张成材. 西宁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3] 李克郁. 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J]. 民族语文. 1987, (3) 31.
- [4] 余志鸿. 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J]. 民族语文, 2000, (3): 2-3.
- [5] 程适良. 突厥比较语言学[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 [6] 许伊娜. 突厥语的条件式及其在现代维吾尔语中的句法功能[J]. 民族语文, 1998, (4): 67-72.
- [7] 杨新亭. 试谈维吾尔语动词条件式不表示条件意义的用法[J]. 民族语文. 1985 年, (2): 41-47.
- [8] 王远新. 从现代哈萨克语看突厥语动词条件式的发展过程[J]. 新疆大学学报. 1982, (4): 119-127.
- [9] 桥本万太郎. 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M]. 语言研究. 1983, (1): 88-97.
- [10] 罗杰瑞, 张惠英. 汉语概说[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 [11] 徐通锵. 历史上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融合问题说略[M]. 语言学论丛(七):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2] 梅祖麟. 唐宋处置式的来源,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3] 陈其光. 语言间的深层影响[J]. 民族语文, 2002, (1): 14.
- [14]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5] 霍凯特. 语言论(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6] 王士元. 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7] 孟达来. 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8] 孟达来. 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9] 钱伯泉. 从血红蛋白基因看西北民族的渊源及迁徙[J]. 西北民族研究. 1995, (1): 2.
- [20] 钱伯泉. 从血红蛋白基因看西北民族的渊源及迁徙[J]. 西北民族研究. 1995, (1): 3.
- [21] 韩康信. 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J]. 西域研究. 1991, (2): 1-13.